



科学技术史与文化哲思

HUISHOU BAINIAN LUYAO

回首百年路遥

——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

姚蜀平◎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科学技术史与文化哲思

HUI SHOU BAINIAN LUY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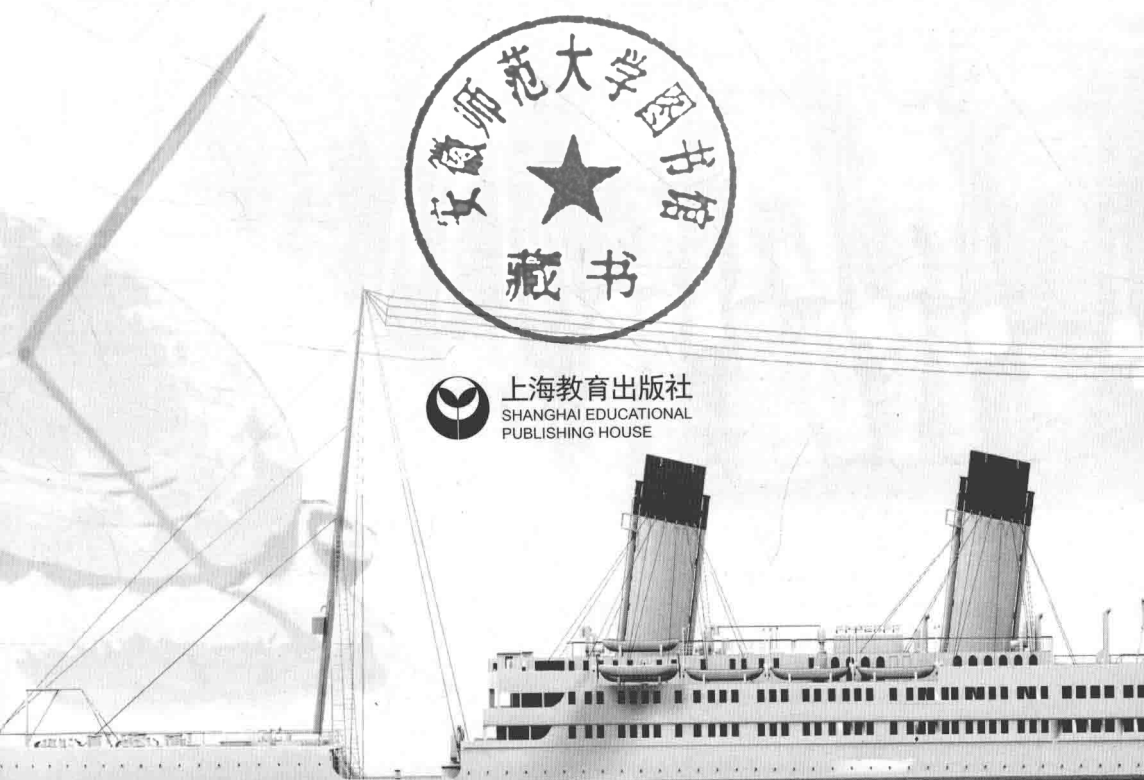
回首百年路遥

——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

姚蜀平◎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 / 姚蜀平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444-7072-8

I. ①回... II. ①姚... III. ①留学教育—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412号

责任编辑 隋淑光 严 岷

封面设计 王 捷

回首百年路遥

——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

姚蜀平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官 网 www.seph.com.cn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3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072-8/G·5822
定 价	49.8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言

前言 1

从最早酝酿到今日付梓,《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这本书历经了 30 年之久。

早在我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后来工作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时,发现学校和研究所许多教授科学家有留学背景,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77 年,我参加了《物理学词典》审稿会,50 多位与会者清一色是一、二级教授或研究员,他们都是早期留学归来学者。和他们近两个月的朝暮相处,激发了我研究物理学史的热情。我知道近代物理传入中国,除了早期得益于外国传教士,其后几乎都是归国留学生作出的贡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高能所转到中国科学院政研室,开始从事科学史研究,所撰写的第一篇论文《近代物理在中国的兴起》即源于此。为了撰写该文,我曾经拜访和请教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褚圣麟与何祚麻等先生。在完稿后,又呈请物理学家严济慈、周培源、钱三强、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和黄昆等先生审阅,他们热情支持和鼓励我的工作,并提出重要建议。上述诸先生中除了何祚麻外,都是归国留学生。我自此在开始研究科学史的同时,也关注留学史。

1982—1984 年,我自带研究课题“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近代物理的贡献”,到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了两年学术访问。期间,我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坐大巴横穿美国大陆,访问了 40 多位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及工程师。他们中的老一代,多是早年留学未归,或是留学后回国工作,抗战后再次出国者;而中青年多是来自台湾地区的留学生。我先后访问的科学家有任之恭、林家翘、吴健雄、杨振宁、丁肇中、张捷迁、范绪筠、



吴大俊、郑洪、田长霖、吴家玮、沈元壤、卓以和、梁佩璐、林同骅等。这个群体使我对留学生及留学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对留学史有了深层思考。我也追踪了留学鼻祖容闳的足迹，从中深深体会到，留学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相伴而生，自此我又开始关注现代化问题。

1985年，我的母校邀请我前往合肥做了两个演讲，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次留学运动”，这是我对留学运动的初步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80年代后期，我曾撰写过一部30万字的书稿《中国百年留学史》。遗憾的是未出版我就赴美讲学，书稿也无果。同在80年代，我做过两件有意义的工作，有机会再次大量访问和接触众多科学家，而他们都是不同时期的归国留学者。其一是书写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其二是参加电视系列片《共和国之恋》剧本撰写工作，我负责该系列片中第二集《热望的凝聚》——专讲归国留学生。为此我又大量拜访了科学家（也包括科学院领导与科学院各级干部）。多次的访问和交谈使我对归国科学家的成长、留学经历、归国道路及回国后的状况等方面，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此间我访问过的归国科学家包括彭桓武、王淦昌、卢鹤绂、李林、杨澄中、施士元、孟昭英、钱伟长、黄昆、汤佩松、冯德培、钱临照、杨承宗等。

我始终把科学史、留学史与现代化问题并行研究，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本书《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在这项研究中，我清楚地看到历史显示，由于现代化的需求，才出现留学运动；而留学生的归来，又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始终如此。

20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百年之际，我撰写了一篇《中国百年留学史》，登载在“财新网”自己的博客上。其后改写并增补的该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第2期。同年秋，我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中文繁体版在美国美亚出版社出版。感谢《科学文化评论》编辑熊卫民教授推荐我予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隋淑光先生，该社决定出版字数倍增的该书中文简体增补版。

让我借此书付梓之际，向过去四十年中，曾经接受过我的采访、给我帮助的诸位科学家前辈，表示由衷的感激和诚挚的敬意！是你们指引我走上这条学术之路，你们通才练识、拔新领导，你们的道山学海珍贵无比；你们为发展中国近代物理学及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存人间。

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时任社长贾立群女士，果断地接受此选题并全力推动此书面世；

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耿坚编审，仔细审读全文，坚持原则，把握住了大方向；

感谢金城出版社总编辑潘涛先生，精心通读书稿，认真修改，积极支持出版；

感谢范岱年老师，我的老同事，在九十高龄之际，不但读完全书，还惠赐修改建议；

感谢赵启正学友，我的科大同班同学，百忙中抽出时间写下感人的推荐语；

感谢王德禄所长，我的老同事，一贯关心和支持我的事业，写下了独特的推荐语；

感谢王作跃教授，科班出身的科学史学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你的推荐语意义非凡；

最后让我怀着诚挚之心，感谢责任编辑隋淑光先生和严岷先生，你们不辞辛劳、耐心推敲、反复核实、多方查证、尊重历史、严谨治学，让书稿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

此书承载着对历代留学先辈的追忆和致敬，你们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不朽贡献。愿它能激励青年一代奋勇向前，学习前辈甚至超越前辈，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和实现强盛与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姚蜀平

2017年4月8日于美国麻省北丛林

目录

引言 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 1

1. 三大西行求法高僧 / 2
2. 盛唐时期留学中国的日本人 / 6
3. 百余幼童赴欧研习神学 / 8

目录 1

第一章 “洋务运动”带来中国首次“防卫性现代化” ——十九世纪幼童留美 / 13

1. 洋务运动的兴起 / 13
2. 容闳首倡幼童留美 / 16
3. 蒲安臣，一位出任中国全权使节的美国人 / 20
4. 首批留美官费生成行 / 23
5. 留美幼童在新英格兰的非凡际遇 / 25
6. 第一次留学潮被挫折 / 28
7. 留美幼童迟来的奉献机缘 / 33
8. 容闳的历史贡献与归宿 / 37

第二章 由“经济变迁”转向“政治变迁”的第二次现代化 ——严复及十九世纪末留欧活动 / 41

1. 中日对现代化的不同理念 / 41
2. 福建船政学堂与第二次留学潮 / 44
3. 先行哲人郭嵩焘的悲剧结局 / 49
4. 严复及其“八大译作” / 51
5. 声扬巴黎的陈季同与马建忠 / 57
6. 王寿昌开启西方文学之窗 / 59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进入第三阶段：政治革命 ——二十世纪初留日高潮及辛亥革命 / 64

1. 清廷转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 64
2. 汹涌澎湃的第三次留学潮 / 68
3. 留日学生的翻译、结社等多种文化活动 / 71
4. 维新人士及革命团体聚首日本 / 74
5. 中共领导人的留日经历 / 77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面临第四阶段：文化层次的变迁 ——庚款留美及新文化运动 / 81

1. 美国《排华法案》的背景及影响 / 81
2.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缘由 / 85
3. 清廷举办全国庚款留美考选 / 90
4. 第四次留学潮之特点 / 94
5. 《科学》杂志及其引领的文化变迁 / 99
6. 引进近代科学的先行者 / 102



第五章 一战后遗症与意识形态困惑的历史性结合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及无产阶级革命 / 109

1. 留法勤工俭学的引领者 / 109
2. 融通中西戏曲文化的齐如山 / 114
3. 留法俭学会与早期俭学生 / 118
4. 勤工俭学会与留法预备班 / 125
5. 二十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法 / 131
6. 第五次留学潮遭遇困境 / 134
7. 学有所成的勤工俭学生 / 139
8. 寻求社会变革之路的革命群体 / 143

第六章 抗战前后留学潮为中国现代化储备人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留学生归国潮 / 148

1. 北洋政府及民国时期的各类留学生 / 148
2. 庚款留美的持续影响 / 151
3. 第六次留学潮为中国科技大厦筑基 / 155
4. “大师的大师”叶企孙 / 156
5. 留学生的热望与回归 / 170

第七章 现代化遭遇人才奇缺的必然出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规模留苏热潮 / 176

1. 清末留俄发端及刘泽荣的传奇一生 / 176
2. 二十年代留苏的国共军政群体 / 184
3. 三、四十年代中共干部、烈士子弟留苏生 / 191
4. 大规模留苏的第七次留学潮与四个现代化 / 193

第八章 海峡两岸现代化人才储备的奇妙两用结局

——台湾学人大规模留美及美籍华裔学者的独特作用 / 199

1. 五十年代台湾继续向西方派遣留学生 / 199
2. 第八次留学潮及台湾留学生未归的前因后果 / 204
3. 滞留留学生提升了在美华人的地位 / 210
4. 华裔美籍学者在特殊时期对祖国的贡献 / 212

第九章 当代现代化兴起与人才断层的悖论

——改革开放后兴起第九次留学热潮 / 221

1. 特殊时期的教育断层现象 / 221
2. 第九次留学潮之门初启 / 226
3. 攻读研究生重回留学主流 / 231
4. CUSPEA 和 CUSBEA / 233
5. 挺立于第九次留学潮头的翘楚 / 237
6. 留学政策与归国潮的关联 / 244

第十章 新时代出现第十次留学潮

——百万留学大军遍布全球 / 250

1. 声势浩大、种类繁多的新世纪留学 / 250
2. 大规模自费留学带来的隐忧 / 253
3. 小留学生的心声 / 255
4. 第十次留学潮之现状与展望 / 263

尾声 中国现代化寄希望于你们 / 272

1. 历代学人论留学 / 272
2. 对当代留学生的寄言与期待 / 280

参考文献 / 284



引言 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1985年，我的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邀请我到合肥作了两个演讲，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次留学运动”。其后我继续关注留学运动的研究，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写过一部30万字书稿《中国百年留学史》，详尽记述了百年来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次留学潮（不是以年龄和辈分划分的“代”）。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付梓，书稿也不幸丢失。今逢千万学人越洋留学，不禁想起自己丢失的手稿和以往的研究；遗憾之余还是想把该演讲稿及手边一些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文字，集合整理成书——曾发表过3万多字的文章（先在个人“财新网”博客、后在《科学文化评论》第12卷第2期，2015年4月发表），2015年10月也曾出版了11万字的繁体字版书稿（美亚出版社，美国，波士顿）。由于篇幅限制和时间仓促，该书仍然未能尽言。今应上海教育出版社邀请，推出简体字增补版，篇幅加倍，以飨众多年轻学子，特别是新一代留学生和准留学生们。由于失去原稿，索引部分仍然留下不少缺憾，盼读者原谅，若读者能从书中获得些许历史知识、感悟与启发，则为本人之幸。

把近一百五十年留学史分为十次留学潮，是按照不同年代官方成批派遣，或民间大量涌现留学生为纵轴，结合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来阐述。事实上中国历次留学潮都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应运而生，中国留学史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历程。此书概述的就是近一个半世纪，伴随现代化历程的十次留学潮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愿以此书表达对历代留学先人的敬意与怀念，以及对当代留学生的期盼与祝福。

1. 三大西行求法高僧

人类的历史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由于自然条件,以后则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鉴于世界各个地方社会发展颇不平衡,在交通工具落后的时代,人们为了交换物品和彼此了解,跋山涉水到异国他乡去;到了交通工具发达的近代,这种交往就更加频繁,并且更多地出现了专门去他国求学取经的留学生。

国家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总是吸引着远近的人们,向往文明和追求进步是人类自发的需求。路程遥远、语言障碍及风俗隔阂,都不能阻止经商冒险和求学取经的人们。而他们的往来,也把人类创造的文明,像撒播种子一样,带到异国他乡,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与外国的交往。元代以前,主要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友好往来。其中除了使臣、商人、探险家外,也有大量僧人。他们往来于漫长的古道,传递信息,交换物品和学习技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若干植物品种、漆器,冶铁技术和水利灌溉、建筑术、医学、天文学等知识,就是这样传入中亚及西方的。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造纸法和印刷术传到欧洲,对推动西方学术和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反之,通过丝绸之路,西

方的植物品种如葡萄、胡桃,以及毛皮织物和珍禽异兽、杂技百戏、西域乐曲,特别是宗教,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中国。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中外文化及经济交流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远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取经的中原僧人,他们可称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其中以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图引.1)最为后世称道,他们既是留名后世的高僧,也是最早为了取经和向学而留学他国的留学生。这从被后人推为三大西行求法高僧之一的义净所言可以看出:“观夫自古



图引.1 玄奘

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法显则创辟荒途，奘法师则中开正路。”^[1]

在生活于公元四世纪的法显之前，也曾有过僧人西去取经，但多是有去无回，或渺无音讯，不知他们是否真有人抵达天竺^[2]，也无人带回过人们期盼的梵文经典。而法显是西去取经并带回多部经律的第一位高僧，自为人们崇敬；在中国佛教史籍中多处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法显是东晋时代山西平阳人，3岁出家，20岁受戒；被称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颇得人们钦佩。在佛门几乎度过一生，已成高僧的法显，在晚年65岁时，感慨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法戒律缺漏失误，传译未全，正如他在《法显传》中自称“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而“至天竺，寻求戒律”。这里已经表明，他此去西域是为求取“律藏原典”，而非经商、探险，也非朝廷公务，是为了求学问、取真经，因此我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去取经的留学生毫不为过。他对后代西去取经的僧人们，包括玄奘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法显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西去取经。在那个时代，马、驴、骆驼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更多的是靠两条腿走路。这位65岁的老人，向着荒漠无涯、不知路途在何方的西域，毅然同4个伙伴上路了！故他也被称为世界性的伟大冒险家和旅行家，为了求真理而去冒险的可敬学者。到了张掖又有5人加入，也有3人退出，剩下7人继续向印度走去。他们中有人中途折返，有人客死他乡，唯法显一人坚持向目的地前行，沿途经过30多个国家，方才抵达天竺。他先后在天竺的诸多寺院里学习梵语梵文，并抄得多种律部梵本，后又南下到狮子国^[3]，继续抄得未见之律经。最后循海路于公元413年回国抵达山东，前后历经15年。返程海路所经风险无数，其经历不逊于任何一个冒险家，只是人们更关注的是法显带回的经书，而多少忽略了他的回国冒险之旅。直到十九世纪人们才开始探究，这位老僧人当年漫长而曲折的回国途中，曾经漂流到过的那片土地，究竟是印度尼西亚还是南美洲。这个话题已经超出本书研究范围，不作深究。我们关注的是法显带回了11部经书，后来由他自己翻译成汉文的有6部63卷，近百万言，因此他也被后人盛赞为伟大的翻译家。我们不要忘记他回国时已是80岁高龄，他来不及翻译的其他经书也由后人陆续译成汉文；现存的诸部广律，几乎多是法显带回来的。除此之外，他还详尽记录了西去15载的经历，那是囊括了古西域、印度及南洋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和文化种种见闻的著名的《法显



传》(又名《佛国记》,成书于公元414年),成为我们了解西域诸国文化,特别是佛教真义的早期重要经典名著。此书在1400年后的十九世纪陆续被译成法文(1868)、英文(1869&1886)、日文(1939、1971&1990),成为东西方学者研究中印文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法显西去求经不仅惠泽佛门弟子,还使整个社会受益,正如圣严大师所言:“佛教不是属于单一国家的,却是能接纳多元民族的优良文化,并且能够融入多民族文化中,促成社会生活的变革。今后我们如能掌握到这一点启事,便可促使多元民族的中国文化,不断地取长补短,舍短补长,而存异求同,可望成为全球文化的主流了。”^[4]

200年后,唐朝出现另一位高僧,他就是德高望重的玄奘。

公元七世纪,在中国唐朝,许多优秀的人出家去当和尚了。他们视庙宇为高等学府,在其中研读佛经;那时的僧人几乎个个经纶满腹,学识高超。可是为了溯本求源,追求学问真谛,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不辞艰辛,跋涉万里,西去求学,为我国和世界留学史开创了光辉的先例。其中功绩显赫者,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玄奘。

玄奘大约出生在公元600年,是唐代有名的高僧。在那个僧人满城的地方,他虽已“誉满京邑”,却仍不满足,困惑于当时法相学的南北之争(北方地论学与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又闻当时天竺有高僧讲学,起念西去求经。不幸当时的朝廷并不鼓励出境,玄奘拿不到朝廷的“过所”(相当于今日的护照)。此时他已经在长安学了外国语,对各家学说也已了若指掌,西去求经决心已定,竟然违背禁令,只身冒险离开京城。其西去取经之惊险经历,被后人用《西游记》作了夸大的描述,使得中国老少皆知,尽管内中夹杂太多神话,但究其西去求经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决不为过。真实的玄奘,没有神通广大的三个徒弟护佑,其遭遇的艰辛较小说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抵达天竺后的种种,国人倒是未必都知晓。

玄奘最终抵达天竺后,进入了当地最大、最兴盛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在那里师从戒贤法师苦读五年经书。其后还走遍整个南亚次大陆,请教各个寺庙里的高僧,学遍大小乘各种学说,多次在印度当时盛行的宗教学术辩论中,舌战群僧,独占鳌头。他甚至曾经代戒贤法师教授《摄大乘论》及《唯识抉择论》,被大乘行者誉为“大乘天”,被上座部佛教徒誉为“解脱天”,那些称谓在佛门都是极高的荣誉。当玄奘自认西

来取经的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携经回国时，鸠摩罗王以建造一百所寺院为代价挽留玄奘；但是他思念故土，没有忘记当初西来的目的，不为所动，像当年决心西去求学一样决心回国。玄奘满载经书，翻山越岭，仍循原路回到中原——我们注意到，法显是陆路去，海路归；玄奘与其不同的是陆路去，陆路归。他自知当初违令西去，回来后即上书唐太宗：“访学，无顾身命。”——这里是说的“访学”，即他是求学问、取真经而去。唐太宗不但宽恕了违令西去的玄奘，还表示：“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并建造大雁塔，收藏他带回的经书。其后还在长安建立了译经院（国立翻译院），专门供其译经。^[5]

玄奘取经历时 17 载，行程 5 万里，于公元 645 年带回佛教经典 657 部。在他开设的译经院里，集中了他的优秀弟子们，前后翻译了佛经 74 部，共计 1330 卷。这些弟子不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有远道慕名而来的东亚诸国佛学弟子。他口述，由弟子记录的《大唐西域记》，更详尽地介绍了西域、中亚、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历史、地理、宗教及社会情况，是《佛国记》之后又一部集宗教与文化之大成的可贵著作。鉴于当时天竺国甚少有历史记录，这部难得的游记兼史书，弥补了对天竺历史地理研究的不足；天竺自此之后，被人们称为印度。直到近代对玄奘留学所经途径的考古挖掘，仍然证明该书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这再次证明玄奘取经是成功的，不仅为当时社会称颂，也为后世认可。^[6]

除了上面所说的东晋的法显和唐代的玄奘，与玄奘同时代的义净也是西去取经的高僧，他曾带回梵语佛典 400 余部。义净小玄奘 35 岁，从小为法显和玄奘西去取经壮举所激励，早在 15 岁时，就萌生仿效先辈西游取经的念头，公元 670 年，才与几位同道结伴西行。他们与先辈不同的是，不再走陆路，而是搭上波斯人的海船，从海路向印度驶去。他也在玄奘去过的那烂陀寺逗留了 10 年，在那里不仅学习经书，同时也翻译经书。直到公元 695 年方才回到中原。当时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以示尊重。回来后，义净与他人共同完成《华严经》的翻译。唐中宗专门为他建立一所翻经院。义净到 79 岁过世时，总共翻译经书 56 部，230 卷。他的译经还附有注释，无形中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故他与法显、玄奘被后人并列为开拓中外交通史的先驱人物。

这些僧人带回的经书，不仅对中国的佛学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还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文学以及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更让人意料不到

的是,在之后几个世纪里,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由于内部派系纷争及伊斯兰教的传入,竟出人意料地逐渐衰微,到十三世纪,佛教在其发源地几乎消亡。有幸的是,它早年已由留学僧人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及东南亚诸国,又由中国传入日本、朝鲜等地;因此,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大重要财富的佛学,避免了失传的悲剧下场。这不仅说明了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是留学活动的可贵成就。

2. 盛唐时期留学中国的日本人

在玄奘等人西去取经求学之时,还出现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来中国的热潮。鉴于中、日同种同文,两个民族关系颇深。自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学问僧(以学佛为目的)惠齐、惠光,医惠日,学生倭汉直福因自唐归,奏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7]那时日本正值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日皇决心向处于封建盛世的唐朝学习。自舒明二年,相当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日使出发,次年到达,这是有记载的日本第一次遣唐使。20多年后,孝德白雉四年(公元653年)五月,发遣大使吉士长丹、副使吉士驹、学问僧道严等13人,学生巨势臣药等共121人共乘一船;另有大使高田根麻吕、副使扫守小麻吕,学问僧道福、义向等120人另乘一船来唐,不幸第二艘船途中翻覆,仅5人幸存。这是日本第二次遣唐使。

这次海难并没有阻止日本继续派遣唐使及学问僧来华,其后在654年(第三次)、659年(第四次)、670年(第五次)、701年(第六次)、716年(第七次)、732年(第八次,此次共有594人)、752年(第九次)、759年(第十次)、764年(第十一次)、804年(第十二次,此次出发时有四船,途中两船漂失无踪;所幸另外两船一漂至福州,另一漂至明州,船上遣唐使及学问僧后分别抵达长安)分别派出遣唐使。

第十三次遣唐使最多波折,从835年四船载有651人起航,途中一船倾覆,另三船返回;两年后又出航,遭逆风,再返回;到838年,第三次扬帆远航,终于抵达中国大陆,众人由扬州进入长安,前后共历时四年之久。这就是有名的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8]其后仍然不断有遣唐的使臣及学问僧来华。26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十七次遣唐使,其中



十三次有留学生及学问僧同行。这十三批遣唐使，总数高达五千人。由于在那个交通工具落后的时代，中日来往唯有靠简陋木船航行在惊涛骇浪、风暴不止的大洋中，危险又艰难。因此这些遣唐使中，五分之三竟然是水手，真正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不及五分之一；现在留名史册的也只有四五百人。他们多数在中国留学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有的最终老死在中国。在此我们不妨举上述第十三次遣唐使的实例，来看看那个时代日本人到中国留学付出何等代价。

在众多的来华遣唐使中，有些学问僧以求佛法真经为目的，跟随大队人马漂洋过海来到中华大地。其中颇有名气的是位名叫圆仁的高僧。公元835年（日本仁明帝承和二年），日本任命参议藤原常嗣为第十三次遣唐使，圆仁以入唐请益僧身份同行，时年45岁。该年7月，藤原率四船同发，不意出海即遇风暴，船身受损，只好折回修理。两年后再次扬帆远航，未料又遭逆风，再次折返回港。到838年6月13日，第三次由九州岛博德出航，途中所遇风浪甚于前两次，可是船已行至大洋，无奈只有与风浪搏斗。第三艘船被风浪掀翻，沉没于大海，船上140人尽数葬身大海；另外三艘船侥幸前行，于该年7月2日，漂泊到中国淮南道扬州府海陵县。上岸后，仅少数人被允许进入长安，多数只许原地待命。圆仁在扬州待命期间，学习梵文和经典。后经许多波折，方被允许前往他一直向往的五台山，当他抵达中台，“伏地遥礼，不觉泪流”。他在此抄得天台宗经书34部、37卷；后又得允许抵达长安，喜获各类经论、章疏和传记423部、559卷。待他欲回国时，却不获唐朝允许——那时正值唐武宗毁寺驱僧之际。圆仁无奈只好蓄发易装南下至登州，直到847年，方得机会乘船返回日本。圆仁历时9年零7个月的取经奇遇，被他用日记形式记载下来，那就是颇有历史价值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9]

而那些学成回去的，在归途中，又有不少人葬身风暴肆虐的大海，故最后真正回到日本的人数有限，但是他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改革，对促进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史学上有记载的留学生有吉备真备、朝衡等19人，他们深究唐朝文化、艺术、制度及经史等方面。而学问僧有道昭等83人，其中除了上述圆仁（慈觉大师）外，有名望的还有最澄（传教大师，804年入唐）、空海（弘法大师，与最澄同于804年入唐）、圆行（838年入唐）、圆珍（智澄大师，853年入唐）、真